

中等收入陷阱系列谈 ③

我国跨越“陷阱”的有利条件

马志刚

最近,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公布了2013年《世界竞争力年度报告》,中国从2012年的第二十三名上升到第二十一名。然而,竞争力提升、国力变强的背后,是中国正面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化解长期粗放增长积累矛盾的严峻考验。

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30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机遇期,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敏感期。这一阶段,经济容易失速,社会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历史上有太多国家落入其中,长期不能自拔。如今,我国已经达到这一阶段,也正面临着这样那样的挑战。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正视困难和风险,千方百计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但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我们与曾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和地区有很多不一样的地

方,具有诸多跨越“陷阱”的优势条件。

市场空间广阔,回旋余地大,当外部市场出现萎缩时,有巨大的潜在国内市场可供开拓,是有利条件之一。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市场需求是最短缺的资源,而潜力最大的市场在中国。我国人口众多,人口比高收入国家总人口还要多,是美国人口的4.3倍,是欧元区人口的4.1倍。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的快速成长,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国内市场加快成长,近年来国内消费以每年17%左右的速度增长就是明证。而且要注意到,目前我国的消费率仅40%多,远低于美、德、日70%—80%的水平,消费总量与经济规模不相称,提升空间巨大。未来,随着种种消费障碍的消除,巨大的消费潜力完全可以转化为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动力。

实体经济发达,产业链成熟,也是我们的优势。与拉美、苏东很多国家产业体系存在严重缺陷、生产替代能力较差不同,我国制造业相对发达,且在多个重要区域、行业形成了完整的配套能力,具有更坚实的产业基础,更有条件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而且,我国地域广阔,各地发展不平衡,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等都存在水平和结构上的差异,使得投资需求具有更大的增长空间,有利于在较小成本下实现产业梯度转移,让产品的生命周期更长,让研发投入获得更多回报。

还要看到,与拉美等国家相比,我国不仅拥有创新资源总量的优势,而且拥有人均创新资源量的优势,技术研发体系也相对完整。5年前,我国每百万人口中就有研发人员700多人,而同年,南非只有370多名,巴西也不到500名。近年来,我国各级科研经费大幅

度增加,研发投入总量已经仅次于美国,位居世界第二。2012年,我国在国内申请专利的数量已经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如今,世界范围内正在孕育和兴起的科技和产业革命浪潮,创新上的优势为我们紧紧抓住历史机遇、实现经济转型创造了条件。

再大的潜力只有释放出来,才能成为现实生产力,而路径就是改革。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效。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提出了“两个全面”、“两个加快”,对以改革释放红利,加快经济转型进行深入部署。下一步,我们最应抓紧做好是,把党的十八大的改革部署切实落实下去,让发展、改革、转变更好地结合起来,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动力活力,凝聚起我国跨越“陷阱”的强大力量,跻身高收入国家行列。

热点透视

拓展服务贸易新空间

河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伴随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产业结构深刻调整,新兴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在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深入发展的趋势中,着力提升服务贸易发展水平,不断拓展服务贸易新空间,对于推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国际合作,对于在世界经济格局深刻变化的大背景下打造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扩大服务贸易的规模。服务贸易是跨境的服务业。去年中国服务贸易总额占全部贸易额的10%左右,明显低于全球20%左右的平均水平。中国要积极拓展信息、金融等服务贸易,不断开拓服务贸易新领域,促进服务贸易进出口均衡发展。中国信息服务贸易基本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但总体竞争力不强,比较优势不明显。虽然中国信息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在世界排名靠前,但却没有显示出竞争优势。要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完善政府职能、调整税制结构,保护国内市场、调整和优化我国信息服务贸易产业结构,加大开发信息服务贸易的人力资源、切实落实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不断提升中国信息服务贸易竞争力。近年来,中国金融服务业伴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由于“基础差”、“底子薄”等条件的制约,导致我国的金融服务业发展缓慢,并存在着金融服务贸易类型结构不平衡、跨境支付金融服务贸易常年逆差、金融服务贸易内部结构发展差距大以及金融服务业监管制度不完善等矛盾和问题。要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创造良好金融服务贸易环境;完善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服务贸易国际信用度;加快“走出去”战略、拓展金融服务贸易空间;完善法律法规、提供健全的法律保障;加快金融市场化改革、培育多元化金融主体,不断增强我国金融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同时,要推动企业更多承接服务外包业务,也欢迎外国公司在华开拓服务外包等业务。

促进服务领域相互投资。目前,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大部分流向服务领域。2012年,我国服务业吸收外资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48.2%,连续两年超过制造业,中国服务业已经成为吸收外资最多的领域。我国商贸企业“走出去”还处于起步阶段,亟待借鉴国际经验、采取灵活的经营方式、完善政府支撑体系,探索“走出去”的新路径。中国将继续支持有实力的服务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境外服务业建设与发展。鼓励外资投向现代服务业,欢迎跨国公司和外国企业投资中国服务产业,引进高技术含量、高端环节的外商投资,完善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的发展政策,促进外商投资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和高端人才,推动外资参与国内的研发活动,加强国际技术合作,继续鼓励跨国公司设立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数据中心、采购中心等功能性机构。中国政府将探索建立自由贸易区试验区,在发展服务业上先行先试,带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构建公平竞争的服务业市场环境。我国已经确立了服务贸易战略地位,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十二五”期间,服务贸易的目标为进出口总额达到6000亿美元,年均增速超过11%。为确保“十二五”服务贸易目标的实现,首先要继续推动重点行业服务出口,在进一步巩固运输、旅游、建筑等行业规模优势的同时,要积极推进中医药、文化艺术、广播电视等行业的服务出口,并重点培育通信、金融、会计等高附加值服务贸易。其次,要培育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服务贸易企业,推进服务贸易领域自主创新,促进服务贸易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发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相配套的服务贸易。要制定服务贸易发展政策,采取多种措施支持服务贸易的发展,完善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体系、政府部门和中介组织协同推进体系,搭建公共服务平台、贸易促进平台、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为包括外商投资企业在内的各类企业提供服务。同时将加强人员流动、资格互认、行业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国际交流。

推动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服务业发展面临历史性的机遇,发展潜力巨大,即将迎来快速发展的春天。要深入推进服务领域各项改革,积极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大力优化服务业结构,努力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环境。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曲折艰难,国际社会应当携起手来,共同推动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为实现世界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执笔:涂小雨)

把握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

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 季晓南

专论

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国有企业改革已经取得很大成效,但改革仍处于进行时,需要进一步解决体制问题、机制问题和结构问题。

有企业和瑞典现有的57家国有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如主要从事不锈钢生产和销售的芬兰奥托昆普公司,2005年的营业额为56亿欧元,不锈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三。

二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有四个作用值得重视。第一,国有企业是国家加快推进工业化建设的依靠力量 and 实现手段。一个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建设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完全依靠市场的自发作用和自身力量,政府采取“不作为”的态度;另一种选择是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种作用、两种力量,政府采取“有所为”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依靠国家的力量大力推进工业化和基础设施建设,国有企业获得快速发展,而国有企业的发展壮大,又加速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第二,国有企业是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重要手段。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与经济危机密切相关,无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还是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美国、英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对一些陷入困境或可能倒闭的大型私营企业都采取了国有化的办法,以避免这些大型企业的倒闭给本国经济和社会造成强烈冲击。第三,国有企业具有创造公共财富和增加政府收入的能力。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预算的执行比较严格,当政府预算出现赤字或投资资金不足时,可以通过国有公司的分红或出售部分国有股权来弥补。第四,国有企业是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重要力量。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少发达国家政府通过重组上市、出售股权等多种方式引进外国资本,鼓励国有大公司、大企业集团尽可能“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成为按国际通行惯例运作的国际化企业。

三是国有企业在我国现阶段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的确立,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既不同于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也有别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既要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要求和本质规定,遵循市场经济国家的一般规律和普遍现象,又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要求。

当然,国有经济地位与作用是一个历史

和动态的过程。一般而言,国有经济的规模与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客观上要求不同规模的国有经济,其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也大不相同。世界银行的一些专家曾对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国有经济发展趋势做过调查,结果显示,国有经济的规模与工业化发展阶段之间存在着内在的联系,他们提出了一种抛物线式的曲线论,即在工业发展的“幼年时期”,国有经济比重最小,分布的领域比较狭窄,发展速度也相对缓慢。到工业发展的“成长期”,即经济起飞阶段,社会对国有企业的需求大大提高,国有经济比重明显快速上升,部门也越来越广。到了工业发展的“成熟期”,国有经济的发展达到最高峰。进入“后工业化时期”,国有经济的比重则逐渐下降,部门分布也开始收缩。因此,要历史地、动态地确定国有经济在一个国家的比重和数额。

三、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

国有企业改革虽然取得很大成效,但仍面临体制、机制和结构等深层次问题,仍处于过程之中。打好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既需要更大政治魄力和勇气,也需要坚持正确方向 and 路径。

一是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使股份制成为国有大型企业的实现形式。股份制是市场经济国家大型企业的一种普遍资本组织形式,也是公有制的一种重要实现方式。要继续推进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需要和具备条件的要尽可能实现整体上市,即通过国有企业集团公司或母公司的股份制改革,在集团层面或母公司层面形成多元投资主体或产权多元化,使集团公司或母公司的资产尽可能进入上市公司。不具备整体上市条件的要加快股权多元化改革,需要保持国家独资经营的也要加快公司制改革。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事关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事关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一方面,要按照中央精神继续深化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另一方面,要警惕以股份制为名推行私有化的倾向,保持国有经济对关键领域和重要行业的控制力。

二是继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步伐。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完善公司治理的关键是要加强和改进董事会建设,因为董事会是委托—代理关系的集合部,一方面,董事会是股

东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保护股东合法权益、体现股东意志的制度依托,是实现出资人职责到位的最终体现;另一方面,董事会负责企业的重大决策,对企业进行战略性监控,并负责企业经理人员的选聘、评价、考核和激励,是企业效率和绩效的重要保证。因此,建立健全有效的董事会就成为完善公司治理的关键,成为大型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国有企业公司治理建设,事关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事关我国的干部人事制度,一方面,要继续总结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公司治理的成功经验,另一方面,要继续探索符合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

三是继续推进国有企业内部改革,加快建立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经营机制。企业的经营机制直接影响到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影响到企业的经营效率和市场竞争能力。经过多年的改革,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总体上看,国有企业的人事、用工、收入分配及决策、淘汰、资本流动等机制尚不能很好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提升竞争能力的一个障碍,成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难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必须解决机制问题。转换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事关职工的进退和企业的稳定,事关职工的薪酬和社会的分配关系,一方面,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坚定不移地深化国有企业内部各项制度改革,尽快形成适应市场竞争要求的经营机制,另一方面,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确保企业和社会的基本稳定。

四是继续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继续推进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是否合理,影响到国有企业的质量和效益,影响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近年来,国有企业布局和结构调整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还存在不尽合理的地方,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影响力,需要继续调整和优化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要完善国有资本有进有退、合理流动的机制,大力推进国有企业重组和调整,推动国有资本继续向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优势企业集中;鼓励企业通过跨国并购、参股、上市、重组联合等方式,加快“走出去”步伐;着力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代表国家实力,配置全球资源,参与国际竞争;引导企业突出主业,加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采用多种方式剥离重组非主业资产;积极利用资本市场和产权市场,吸收民间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格局。

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机遇与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有为

我国正处在服务业加速发展的重要时期,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面临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机遇方面,一是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近年来,我国服务外包产业扩张迅速,并初步形成了以国家级服务外包示范城市为主导的产业发展体系。我国今后将更加重视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通过营改增等举措加大对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减税,通过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增强产业发展的活力,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二是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服务业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大于制造业,发展服务业是当前保就业的重要举措。大力发展包括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在内的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

促进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型,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这将为软件和服务外包产业的发展开拓更为广阔的空间。三是发展方式的转变扩大了服务外包需求。我国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将一些服务项目通过政府采购、公开招标等方式委托给社会上的专业化服务机构来完成,扩大了服务外包需求。一些重点大型企业开始注重软件外包服务。

挑战方面:劳动力成本上升,人力成本一直是国内服务外包企业最大的支出,约占营业收入的60%至70%。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充分发挥低成本竞争优势,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在国际市场上赢得了大量加工贸易订单,逐步发展成为全球加工制造中心,是

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不过,随着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由过去的几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的转变,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发生重要变化,中国逐步接近甚至达到刘易斯拐点。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出现刘易斯拐点后,由于剩余劳动力已经为工业和服务业所吸收,就会从劳动力过剩转向劳动力不足,工资的上升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从而引致相关产业走向衰落。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过去几年内加速攀升,目前低成本的优势已经丧失殆尽甚至出现了一定的劣势。印度、泰国、越南等国不仅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而且劳动力规模比较大,对我国服务外包行业的发展将形成一定的冲击。因此,我们要

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充分利用国内中高端人才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目前,我国软件等行业中高端人才的国际竞争力逐渐显现,并且成本相对较低,组织纪律性强,可充分利用这一比较优势,加强研发团队建设,发挥协同效应,提高全球交付能力,打造可持续服务交付优势,在此基础上培育品牌 and 影响力。二是发掘新的市场机遇。我国政府部门、企业、社会团体加强外包合作是今后的潮流。此外,我国服务领域经营管理创新正在逐步深化,特别是在商贸、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领域,现代化管理方式、经营组织、服务业态、技术手段被广泛应用,软件和服务外包企业可以有针对性地提升服务能力,争取获得更多的订单。

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举办

本报讯 由北京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辽宁大学、经济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会联合主办,辽宁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民营企业研究中心等单位承办的“第五届中国经济学前沿论坛——经济转型的中国道路”日前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近500人参加了会议。

论坛发布了2012年中国经济学热点前10排名及其变化,对“当前经济转型的路径”这一热点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会者一致认为,经济转型是我国进入中等收入新阶段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只有实现经济转型,才能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并从宏观到微观、从改革到发展、从城市到农村、从工业到服务业、从消费到投资、从国内到国外,多角度地探讨了经济转型的中国道路。

(吴峰)